

中韩语法史上的双子星座

——《马氏文通》和《大韩文典》

朴云锡 陈榴 著

北京大学

H141
P62 ✓

中韩语法学史上的双子星座

——《马氏文通》和《大韩文典》

朴云锡 陈 榴 著



A1058275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韩语法学史上的双子星座——《马氏文通》和《大韩文典》/朴云锡, 陈榴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10

ISBN 7-301-05455-6

I. 中… II. ①朴…②陈… III. ①马氏文通-研究②大韩文典-研究
IV. ①H141②H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79339号

书 名: 中韩语法学史上的双子星座——《马氏文通》和《大韩文典》

著作责任者: 朴云锡 陈 榴

责任编辑: 郭 力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455-6/H·0716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9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8

排 版 者: 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82866441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毫米×1240毫米 A5开本 5.875印张 167千字

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6.00元



目 次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本书的缘起	1
第二节 《马氏文通》与《大韩文典》的版本	5
第三节 研究史概况	7
第二章 《马氏文通》和《大韩文典》的产生	23
第一节 《文通》、《文典》产生的时代	23
第二节 马建忠、俞吉濬的生平和思想	35
第三节 《文通》、《文典》产生的条件	48
第三章 《文通》、《文典》与语法的共性	69
第一节 《文通》、《文典》的语言哲学和语法观	69
第二节 《文通》、《文典》与《普遍唯理语法》	74
第三节 对《文通》、《文典》“模仿”的再认识	80
第四章 《文通》、《文典》语法体系比较	85
第一节 《文通》、《文典》概述	85
第二节 《文通》的“字类”与《文典》的“品词”	87
第三节 《文通》的“词”与《文典》的“本原”	99
第四节 《文通》的“一元论”与《文典》的“二元主义”	107
第五节 《文通》的“句读”与《文典》的“文章”	117
第五章 《文通》、《文典》的学术价值及历史贡献	145
第一节 开创了中韩两国的语法学时代	145
第二节 揭示了汉语和韩语语法的基本规律	149

第三节 验证了语法普遍现象的存在	153
第六章 结论	157
附录一 马建忠、俞吉濬生平事迹年表	161
附录二 参考文献	165
附录三 中文提要	173
附录四 英文提要	175
后记	179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本书的缘起

当我们完成这部书稿的时候, 21世纪的序幕已经拉开。柏拉图(Plato)在《理想国》中有一个精彩的“洞喻”: “亮光就在你背后。” 蓦然回首, 我们发现了历史隧道中的一个亮点, 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 在一个世纪以前, 中国和韩国有两位献身于本国近代化运动的先驱者, 他们退出政界, 不约而同地致力于本国语法的研究, 并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他们就是中国的马建忠(1845年~1900年)和韩国的俞吉濬(1856年~1914年)。马建忠“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 以成此编”¹⁾, 完成了第一部汉语语法专著——《马氏文通》(简称《文通》, 1898年); 俞吉濬“三十星霜을 经호야 稿를 易함이 凡八회에 此书가 始成호니”(历经三十星霜, 易稿八次, 始成此书。) ²⁾, 写出了第一部韩语语法专著——《大韩文典》(简称《文典》, 1909年)。这两部杰出的语法学著作开创了中韩两国的语法学时代, 在两国语法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 只要谈到两国的语法学史, 都必须提到这两位语法学巨人和这两部语法学的开山之作。但是, 两国学者至今尚未从比较的角度对这两本书进行过研究, 这无论对两国语法学史的建设, 还是对语法研究方法论的完善, 显然都是一个缺憾。我们认为, 《马氏文通》和《大韩文典》有共同的产生背景, 有共同的体系来源, 有相同的方法论, 有相同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 因此已经构成了比较研究的基础。

《马氏文通》和《大韩文典》几乎同时出现, 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而是历史的必然。这两部书均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西学东渐时期, 这正是东西方文化激烈冲突的时期。马建忠是中国

近代史上“洋务派”的重要成员，而俞吉濬则是韩国近代史上“开化运动”的先行者，他们都是当时“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在中韩两国同处于内忧外患，两个民族同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他们为什么要退而研究语法，并借助西方语言学理论建立起本国的语法体系？个中原因值得深思。我们认为，这一方面与他们开通民智，推动变革的初衷有直接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已经具备了建立两国语法体系的条件。语法体系的建立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即：语言材料的定型与完备，语法意识的萌发与形成，研究者的文化素养与语言素养，科学语法理论的借鉴与指导。汉语属于汉藏语系(Sino-Tibetian family)，韩语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Ural-Altaic family)³⁾，它们都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语言，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自成体系的语法结构；汉语和韩语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使用者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语法意识；马建忠和俞吉濬熟谙本土文化与本国语言，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马建忠精通法语、拉丁语、希腊语和英语，俞吉濬精通汉语、日语和英语。一切条件似乎都已具备，只差科学的语法体系的框架了。恰在此时，随着中韩两国门户的被迫开放，西方语言理论乘势而入，而且十九世纪正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崛起的时期，语言学的研究相当活跃。至此，中韩两国建立语法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文通》和《文典》遂应运而生。尽管这两部书的研究对象分属不同的语言类型，但所依据的语法理论都来源于西方传统的《普遍唯理语法》⁴⁾。正是由于他们对西方语法的模仿，所以一直受到后人的批评。但我们认为，要在中国和韩国这两个基本上没有语法研究传统的国度建立语法体系，模仿是不可避免的。日语语法体系的建立也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只是比中韩两国稍早。尤其应当指出的是，《文通》和《文典》在模仿西方语法体系的过程中，不仅有牵强比附之处，也有成功之处，更有创新之处。因此，对这两部书所建立的语法体系重新予以审视，并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搞清属于孤立语的汉语和属于黏着语的韩语，与属于屈折语的印欧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范围内存在共性，因而是可以仿效的；哪些地方又是汉语和韩语的个性所在，因而是无法照搬印欧语的，这对两国今后的语法研究

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马氏文通》和《大韩文典》对后世的语法研究影响极大。《文通》已经问世102年了，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汉语语法的研究对《文通》所建立的语法体系并没有很大的突破；《文典》也已经问世91年了，它所建构的语法框架和使用的语法术语至今仍基本保留着。而且，两国学者吸收西方语言理论（如50年代的结构主义语法，70年代的转换生成语法等）的步伐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可见，这两部书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对后世都有重要的启蒙作用。还应当指出的是，《马氏文通》是马建忠“中体西用”的一次成功实践，而《大韩文典》则是俞吉濬“开化思想”的延伸和体现。他们并不是将本国的语法研究作为一种纯学术的研究，也不是出于纯理性的研究动机，而是将自己的研究作为保存民族文化，振兴民族精神，普及教育，汲取新知，加速本国近代化进程的一个切入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部书都是弱国追求近代化和富国强兵的语文宪章。当然，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价值中立”和“方法多元”的学术研究原则，而这一点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现在更应该思索的是：如何在吸收西方语言理论的同时，更注重本国的语言实际，使科学主义和人文精神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不断完善我们本民族语言的语法体系。这正是我们进行这一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总之，本文的撰写目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通过分析成书背景和成书过程，知人论世，梳理出两位作者共同的学术思想和研究动机。我们认为这是进入《文通》和《文典》研究的一条门径，是从宏观上把握二书语法体系的一把锁钥。既往的研究对这一点重视不够，而孤立地考察体系本身，往往失之于片面。

其二，通过对《文通》和《文典》方法论的分析，探讨这两部书的语法观和语言哲学。《文通》是直接地而《文典》则是间接地吸收了普遍唯理语法的基本理论。明确了这一点，将对这两部著作模仿西方“葛郎玛”(Grammar)的问题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其三，通过《文通》和《文典》所建立的汉语和韩语语法体系的

比较,进一步考察它们在描写本国语法时的偏颇与创见,并分析其发生的原因。既往的研究更多地注意了它们的模仿,而忽略了它们的创新,其实,这才是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其四,通过论述《文通》与《文典》对中韩两国语法学史的贡献,对这两部著作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并对今后两国语法学的发展趋势做出展望。我们认为,《马氏文通》和《大韩文典》已经提示了两国语法学的发展方向,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借鉴与创新的结合,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结合。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主要采取了以下两种研究方法:

其一,将研究对象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观照。《马氏文通》和《大韩文典》的出现绝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们之所以应运而生,与当时西学东渐的开放大势,中韩两国“中体西用”和“东道西器”的文化模式,西方语言学的蓬勃发展,以及马建忠与俞吉濬的政治思想和学术素养,都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研究方法,先从两部书的产生背景入手,然后再进入这两部书语法体系的比较研究。

其二,通过比较发掘研究对象的共性与个性。本文自始至终采用比较的研究方法。法国语言学家梅耶(A·Meillet)指出:“进行比较工作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从比较中揭示普遍的规律,一是从比较中找出历史的情况。”⁵⁾我们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综合运用了这两种比较方法:通过《文通》和《文典》语法体系的比较,揭示两国语法学在初创时期的基本面貌及共同特征;通过《文通》和《文典》产生过程的比较,梳理出两国语法学形成和发展的线索。具体来说,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比较项目	马氏文通	大韩文典
作者	马建忠 (1845~1900年)	俞吉濬(1856年~1914年)
成书年代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1909年(第8次稿本版行)
历史背景	西学东渐 洋务运动	西势东渐 开化思潮
研究动机	开通民智 科学救国	振兴国语 开通民智
研究对象	古代汉语(孤立语)	近代韩语(黏着语)
研究内容	词法 句读	言言论 文章论
研究方法	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 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	样을依호아葫芦을画호이,覽者의邯鄲步를學호는丑態로대,傍走호야도,京府에亦达호。(依样画葫芦, 跛者邯鄲学步, 虽然丑态百出, 旁走斜行, 但也可达京城。)
语法理论	普遍唯理语法(直接)	普遍唯理语法(间接)
体系来源	拉丁语法 其他印欧语法	日本语法 翻案语法
学术思想	经世致用 中体西用	利用厚生 东道西器
学术贡献	创建汉语语法体系	创建韩语语法体系

第二节 《马氏文通》与《大韩文典》的版本

《马氏文通》最初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十卷,前六卷(正名,实字)出版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后四卷(虚字,句读)出版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该版本是竹纸铅排线装的六开本。在第六卷的最后附有“校勘记”,“校勘记”之前有几句类似“跋文”的话:“《文通》之作,其用意具详前后两序并凡例矣。一时草创,未暇审定,本不敢出以问世。友人见者,……怂恿就梓,得六卷,而论实字已全。其论虚字,论句读,且俟续印。建忠自记。”文中说“本不敢出以问世”云云,说明此版本系初印本无疑。此版本虽印有“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翻刻必究”的版权声明,但翻刻本仍复不少,现在能看到的大约有以下三种:

①翻版本刻本。目录前页印有“绍兴府学堂教科书光绪壬寅正月依马氏原书排印本钺木”。“壬寅年”是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此版本

完全是照原本翻刻，连卷六所附的“校勘记”和马氏跋文也不少。

②翻刻石印本。书前印有“光绪壬寅年秋月上海文林石印”。此外还题有“校正马氏文通”的字样，实际上不但校正不精，反而出现了许多错误。

③翻刻铅印本。书前印有“光绪甲辰年秋日成都官报书局排印”。“甲辰年”是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此版本与原刻本行款完全相同，有跋文，但无“校勘记”。

后来，商务印书馆于1911年出版了大字洋装的四开本；1929年10月出版了铅印平装的“万有文库”本；1933年4月又出版了铅印精装的《马氏文通及其刊误》，由《马氏文通》和杨树达的《马氏文通刊误》合订而成。我们现在所依据的版本是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的重印本。

《大韩文典》最初由汉城同文馆于隆熙三年(1909年)出版，为国汉混用体的活排本。俞吉濬在该书“绪言”中说：“本著者가 国语文典의 研究로 三十星霜을 经하야 稿를 易함이 凡八次에 此书가 始成하 니.”(本著者研究国语文典，历经三十星霜，易稿八次，始成此书。)那么，据此推测，俞吉濬开始研究国文法的时间大约是在1881年(高宗十八年)前后，即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他八稿中的四稿，即第二稿，第三稿，第四稿和第八稿。^⑥四稿的具体情况如下：

①第二次稿本。稿名《朝鲜文典》，大约成稿于1898年至1900年间，手写本，未刊行。原稿本现由其后人俞炳德收藏。1971年出版的《俞吉濬全书》第二卷收入了这一稿本。

②第三次稿本。亦名《朝鲜文典》，稿本封面有“大韩光武八年六月廿二日造 桂山堂所藏 安箕善所有物”的字样，说明该稿本成稿于1904年(光武八年)以前。手写本，未刊行。原稿现由金敏洙教授收藏。

③第四次稿本。改名《大韩文典》，此稿本因“误落世间”，被崔光玉攫为己出，并于1908年(隆熙二年)由普成社出版，由此酿成一段版权公案。

④第八次稿本。1909年(隆熙三年)由汉城同文馆刊行，书名仍为

《大韩文典》，1971年出版的《俞吉濬全书》第二卷收入了这一版本的影印本。这是俞吉濬正式出版的惟一版本，也是我们进行研究所依据的版本。

关于崔光玉《大韩文典》“剽说雷同”的问题，俞吉濬当时已经察觉，他在《大韩文典》绪言中指出：“第四次稿本이 世間에 誤落호야 愛書家의 印布함이 再版에 至호나。”（第四次稿本誤落世間，為愛書家所刊行，以致再版。）这里的“愛書家”指的正是崔光玉，崔氏的《大韩文典》在1908年（隆熙二年）确实刊行了两次，初版是1月，而再版是6月。俞吉濬没有直接指明崔光玉就是抄袭者，显示出俞氏为人的宽厚；他之所以指出这一事实，是因为“该稿本은 舛謬호 點이 多호야 讀者의 惑을 反滋호 虞가 有함이라 是를 懼호야 一言을 贅호노라”，（担心该稿本舛误处多，反滋读者疑惑，有惧于是，因赘一言。）完全是出于对读者负责的学者态度。对于《大韩文典》的这段公案，韩国学术界也早已提出质疑，安廓、金允经、崔铉培、李熙升等学者都做过初步的论述。1956年，金敏洙教授发表了“《大韩文典》考”一文，将署名“崔光玉”的《大韩文典》与俞吉濬的《大韩文典》进行了详细的比勘，以充足的论据坐实崔光玉的《大韩文典》就是俞吉濬的第四次稿本。至此，这一段版权公案始成定讞。

第三节 研究史概况

《马氏文通》于1898年正式出版，至今已经102年了；《大韩文典》于1909年出版，至今也已经有91年了。星移斗转，百年沧桑，中韩两国的语法学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当我们回顾中韩两国语法学的发展进程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两部书非但没有被人遗忘，反而历久弥新，不断给语法学的研究以新的营养。作为语法学研究的宝贵财富，它们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已经得到确立。所以，一个世纪以来，两国的语法学研究始终是以这两部书为起点或主线而展开的。

对《文通》的研究

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中国语言学界对它的研究和批评从来没有停止过,正如陈望道先生说的:“‘忆了千千万,恨了千千万’,对于《马氏文通》体系的千万忆恨缠结也就从这一部书出版的时候开始。”⁷⁾《文通》不仅开创了中国的语法学时代,而且导致了中国语法学批评的出现。纵观中国的语法学批评史,几乎就是对《文通》的评论史。对《文通》的评论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98年~1937年)⁸⁾:《文通》是第一部汉语语法书,也是东西文化开始结合的产物。它一出版即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人们对它的学术价值和开创之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杨树达说:“自马氏著《文通》而吾国始有文法书,盖近四十年来应用欧洲科学于吾国之第一部著作也。其功之伟大,不俟论矣。”⁹⁾ 缪子才说:“鄙人对于《马氏文通》,钦其精博,谓作者心境极虚灵,而眼界极宽阔也。”¹⁰⁾ 黎锦熙说:“这究竟是第一部沟通中西之大规模的创作,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也。”¹¹⁾ 胡适说:“世界文法学发达最早的,要算梵文和欧洲的古今语言。中国的文法学发生最迟。……直到马建忠的《文通》出世(光绪二十四年,西历一八九八),方才有中国文法学。”¹²⁾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通》的影响已超出了学界,还引起了当时政界的关注。著名的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热情地称颂马建忠“创前古未有之业”¹³⁾,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也充分肯定说:“中国自古以来,无文法文理之学,……自《马氏文通》出后,中国学者乃知有是学。”¹⁴⁾ 显然,马建忠的这部力作契合了他们推动社会变革的政治思想,所以才能引起他们的关注。

在充分肯定《文通》学术价值的同时,学者们也对马建忠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这些批评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机械模仿,二是厚古薄今。进入20年代,中国语法学界对《文通》的评论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派主张保留《文通》所建立的语法格局,只有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做一些修正,这一派被称为“修正派”;另一派则主张推翻这一语法格局,重新创造出一个新格局,这一派被称为“革新

派”。革新派有两部代表作，一部是刘复先生的《中国文法通论》（上海群益书社出版，1920年），一部是金兆梓先生的《国文法之研究》（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22年）。他们在书中明确表示反对马氏的安排，主张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历史和习惯，重起炉灶，再搞出一个新计划来。不过，金兆梓先生只是做了个“发端”，而刘复先生也只是依据斯威特（H·Sweet）的《A New English Grammar》重新拟了一个体系，未改模仿一路，可见这个“新计划”并未成功。相比之下，修正派无论在阵容上还是在著作上都比革新派要占有优势。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22年），黎锦熙的《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1924年），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等。此外，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商务印书馆）虽然出版于1907年，但其内容也属于修正一派。修正派建构的语法体系与《文通》基本相同，只是在个别地方略有差异。

第二阶段（1938年～1948年）¹⁵⁾：这一阶段对《马氏文通》的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一方面充分肯定马建忠的功绩，另一方面又努力在《文通》语法体系的基础上寻求创新。1938年上海学术界发起了“文法革新”讨论，影响很大，学者们开始改变照搬西方语法学框架来建立汉语语法体系的做法，试图借用西方语言理论独立地研究汉语语法，但是“革新者”所提出的新体系在本质上并没有超过《马氏文通》。¹⁶⁾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42年），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43年出版上册，1944年出版下册）和高名凯先生的《汉语语法论》（开明书店，1948年）。吕、王两先生的书都力图摆脱印欧语的羁绊，探索汉语自身的语法规律，《中国现代语法》在句法结构的分析上有许多创见，而《中国文法要略》则对汉语句法进行了全面的语义分析。这两本书都模仿了叶斯泊森的“词品说”¹⁷⁾，企图代替马氏的“词类假借说”，这一点也受到了后人的批评。可见，想摆脱印欧语法的羁绊，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正如朱自清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序言中所言：“‘脱模仿之窠臼’是不容易的；知道哪些是‘模仿之窠臼’，自然可以脱离，苦的是不知道。这得

一步步研究才成。英国语法出于拉丁语法，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它的窠臼呢。”这一时期是中国语法学的发展时期，随着语法学的发展，人们对《马氏文通》的研究也渐趋深入。

第三阶段(1949年~1979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马氏文通》的研究较为活跃，特别是1958年《文通》出版60周年之际，在上海召开了纪念《马氏文通》出版60周年座谈会，《复旦》月刊1959年第3期集中发表了一批论文，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这些论文是：

陈望道 漫谈《马氏文通》（《复旦》月刊1959年3期pp. 1-6）

郭绍虞 从《马氏文通》所想起的一些问题（《复旦》月刊1959年3期pp. 7-13）

吴文祺 关于《马氏文通》（《复旦》月刊1959年3期pp. 14-18）

胡裕树 关于《马氏文通》（《复旦》月刊1959年3期pp. 19-21）

这些论文仍然充分肯定了《文通》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但对马建忠“机械模仿”和“厚古薄今”的做法进行了更为激烈的批判。这与当时的政治空气有直接的关系。建国以后，毛泽东一直提倡“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治学方法，反对“崇洋媚外”，“厚古薄今”。《马氏文通》是模仿西方语法之作，研究对象又是文言，“洋”、“古”兼而有之，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自然在劫难逃。而且，50年代曾发动过一场批判胡适资产阶级买办思想的政治运动，1958年又正值“反右派”运动之后，学术界人人自危，动辄得咎，学术研究已无公允可言。于是，曾被胡适高度评价过的《马氏文通》必然受到殃及，它的功绩被一带而过，而失误被放大贬斥，便也是情理中事了。

这一时期，中华书局出版了章锡琛的《马氏文通校注》（1954年10月）。此外还出版了一些汉语语法著作，这些著作无一例外地全都谈到了《马氏文通》，但都属于综述性质，并没有什么新的见解。其中比较重要的著作有胡附、文炼的《现代汉语语法探索》（上海东方书店，1955年），岑麒祥的《语言学史概要》（科学出版社，1958年），郭锡良等《近六十年中国语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60年）等等。此外，还有

一些论著,对《文通》语法体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因缺乏深度,总体质量平平。50年代后期建立了《暂拟汉语语法系统》,综合了《马氏文通》出版以来60年的语法研究成果,作为中学的教学语法,影响很大,但基本框架较之《马氏文通》仍未有很大突破。

1966年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学术界一片荒芜,对《马氏文通》的研究完全陷于停顿。但即使在这时,也仍有学者坚持研究《马氏文通》,显示出极大的学术勇气,孙玄常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吕叔湘先生的指导下,从1966年秋冬开始重读《文通》,全面分析《文通》的语法体系,至1971年共写出14篇札记。吕叔湘先生于1972年校阅了全稿,他在批语中指出:“这篇札记是对《马氏文通》的一个述评,颇能抓住要害。对马氏书中区分字类,划分句子成分,区分句读等方面的种种矛盾,都已经扼要地予以揭露。”同时,吕先生还从更深的层面上阐明了《文通》的价值:“《文通》这部书几乎到处是矛盾,但是在今日仍然不失为一部重要的著作。其所以重要,我以为,除开创之功不可泯没外,正在于著者自己不意识到其中的矛盾而让它尽量呈现。继马氏而起的语法学者大都看到了《文通》内部的矛盾(不管看到的多或少),把容易解决的解决了,把难于解决的掩盖起来。他们的体系看起来比《文通》干净、完整,但是不如《文通》更能刺激读者的思考。”吕先生的这段批语可以视为对此前《马氏文通》研究的总结。孙玄常的“《马氏文通》札记”后来收入《汉语语法学简史》,1983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第四阶段(1980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给学术研究注入新的生机。在这种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对《马氏文通》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阶段开始的重要标志是吕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在1980年写的两篇序言。吕先生在“重印《马氏文通》序”中指出了《文通》的三大优点:第一,收集了七千到八千个古汉语例句,迄今还没有一本语法书能超过它;第二,不以分类和举例为满足,而是努力找出规律;

第三,分析语法,常常涉及修辞。朱德熙先生在“《汉语语法丛书》序”中对《马氏文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马氏文通》往往因其模仿拉丁语法而为人诟病。其实作为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书,能有如此的水平和规模,已经大大出人意表,我们实在不应苛求于马氏了。只要看《文通》问世二十余年以后出版的一批语法著作,无论就内容的充实程度论,还是就发掘的深度论,较之《文通》多有逊色,对比之下,就可以看出《文通》的价值了。”吕序和朱序不仅概括地总结了《马氏文通》出版以来的研究情况,而且指明了今后的研究方向,这就是:不要再纠缠和指责《文通》对西方语法的模仿了,而应在理论上,在更深的层面上来探讨和评价《文通》的语法体系。王力先生也指出:“马氏以后,有许多人都批评他照抄西洋语法,这其实是没有细读他的书;又有许多人批评他不合理理论(即不懂语法理论),其实是所见不广。”¹⁸⁾王力先生的这一批评直率而尖锐。有些研究者确实没有真正领会《文通》所建构的语法体系,所论难免失之肤浅,所以今后的研究者应当先读懂《文通》,然后再评论《文通》。

由这些语言学界的前辈们导夫先路,进入80年代以后,对《文通》的研究也进入了更为科学的轨道。1983年,《马氏文通》由商务印书馆再版,进一步推动了对《文通》的研究。80年代以前的《文通》研究基本上囿于词法和句法,80年代以后则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领域,已开始涉及《文通》的语言哲学、语法观、语法研究与修辞研究的结合、研究方法,以及《文通》与汉文化的关系等等。这一时期的主要论著有:

季绍德 评《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研究的贡献

《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2期

孙玄常 《〈马氏文通〉札记》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2年

吕叔湘 王海棻 《马氏文通》述评 《中国语文》1984年1、2期

董杰锋 《马氏文通》和《新著国语文法》说略

《辽宁大学学报》1984年3期

吕叔湘 王海棻 《〈马氏文通〉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6年